

青海文史資料選輯

第十一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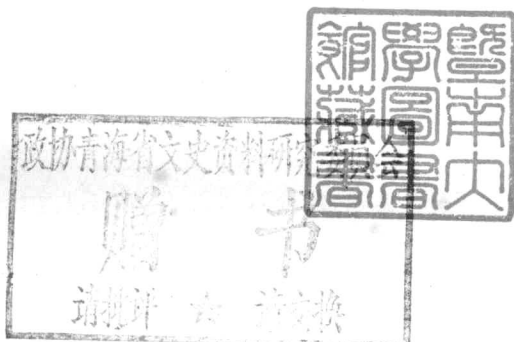
K294.4

711

11

青海文史资料选辑

第十一辑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三年八月

青海文史资料选辑

第十一辑

(内部发行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*

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 字数：122,000

目 录

身陷虎穴 红心向党

- 回忆长征途中在青海的一段坎坷历程……………欧阳辉（ 1 ）
- 在进军西北的路上……………林 彬（ 14 ）
- 进军青海的片断回忆……………周恕原（ 19 ）

- 玉树和平解放经过……………张文宪等（ 27 ）
- 共和县解放初期建政的若干回忆……………马芳富（ 35 ）
- 同仁解放前后……………扎喜安嘉 多 杰（ 40 ）
- 同仁地区解放初期的建政情况
……………杨耀祖 邓靖声（ 45 ）

- 柴达木盆地第一次科学考察纪实……………朱新德（ 49 ）
- 解放前青藏公路（宁玉段）修筑概况
……………青海公路交通史编写办公室（ 58 ）
- 解放后修筑青藏公路纪实……………张炳武（ 64 ）
- 大通煤矿的变迁……………青海师范学院历史系（ 79 ）

- 我所知道的胡马矛盾……………沈重宇遗稿（ 89 ）
- 马呈祥在新疆解放前夕出国的经过……………马得勋（ 94 ）

马英骑兵旅覆灭经过·····	铁焕玲 (101)
民国时期青海禁烟内幕·····	王剑萍 王中兴 (104)
马步芳垄断青海金矿的记述·····	李庆芬 (112)

回忆马步芳时期的蒙藏文化教育·····	才仁加 (120)
解放前的民和教育·····	余 先 (129)
解放前的互助教育·····	戴朝魁 (133)
青海少数民族的民间体育活动·····	方协邦 方成邦 (136)

来 稿 摘 登	互助和平渠今昔·····	张友邦 (148)
	马步芳的保甲制度和壮丁训练·····	牛怀民 (150)
	“以马代丁”真相片断 ·····	东斌德 张 信 (153)
	解放前植树造林点滴·····	范玉堂 (154)
	丹德尔解放前后的一些事迹·····	深 林 (158)

身陷虎穴 红心向党

——回忆长征途中在青海的一段坎坷历程

山西省军区顾问 欧 阳 辉

一九三六年，我作为红军西路军的一个医生，被青海军阀马步芳的部队俘虏后，日日夜夜都在想念着党、想念着红军。经过一年半的曲折历程，我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，回到了自己的队伍。

（一）

长征开始时，我在红一方面军工作。翻越雪山时，因生病掉队被四方面军收留，后来就转到四方面军的一个后方总医院当了医生。

当我西路军在河西一带与敌军辗转苦战后，粮、弹已严重缺乏，而且随着向敌区的逐步深入，形势对我越来越不利。这时敌人已获知我军的困难处境，在我军转移时，更加猖狂地围追堵截。我们的部队包括妇女独立团和我们医院的医生、护士、伤病员们，都无畏地拿起大刀、长矛，与装备精良的强敌血战。在连续恶战中，使部队大量减员，在那茫茫的戈壁滩上遍洒了红军儿

女的鲜血。

正在这异常困难的日子里，突然又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，记得有一天早晨，我在睡意朦胧中，觉察到在我们宿营地周围出奇地寂静。我忙爬起来一看，不禁呆住了，有的同志怔怔地站着，有的双颊挂满着泪珠，有的正默默哭泣！一片愁云笼罩着戈壁。我冲到一位老大哥面前，摇着他的胳膊问：“告诉我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他嘴唇哆嗦着，半晌，才嘶哑着嗓子回答我：

“我们与总部、主力失去了联系！”我的心猛地向下一沉，浑身的血似乎凝固了，身子差点儿跌倒。在凶恶的“狼群”中，与主力失去了联系，将给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带来什么样的苦果呢，这是连小孩子也是很清楚的！我疯了似地奔上一个不远的土丘上眺望，果然除了半天流霞，没有看见总部、主力的一丝影子。顿时我心头感到一阵颤抖，痛苦的泪水刷刷地流下来。

我和那位老大哥和几个要好的同志，围在一起商量去处，大家七嘴八舌，各抒己见，最后决定往山里跑，先躲过敌人大搜捕的势头，再设法回内地去找党、找红军。不少同志，特别是一些女同志拿不定主意，一见我们往山里跑，也都跟上来，到山里一清点，竟有二百多人。这是一支可观的队伍啊！起初，我们天真地想，今后就留在山里打游击，后来感到这个想法十分可笑。因为这二百多人除了拐杖、药箱外，没有一支枪，粮食也仅有很少的一点。深秋的山野，树上无果，地上无草，找不到任何可以充饥的东西。在这样的困苦的条件下，长期坚持战斗，当然是不可能的。但我们靠着那一点粮食仍然在山里藏了十几天。在这十几天中，又有同志跑进山里来告诉我们“留在山外的战友大多数被捕牺牲”的消息，诉说敌人如何虐待俘虏，如何奸淫妇女的骇人暴行。这一切更加激起了我们对敌人的无比仇恨，坚定了与敌

人战斗到底的决心。

十几天以后，风声似乎小了一些。我们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，一些伤残体弱的同志被折磨得奄奄一息。如果在这里继续呆下去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于是，在一天下午，我们相互搀扶走出大山，来到山口的一个村庄，村里的群众早已跑光，看来敌人刚走不久。▲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不顾一切地进了村。当时群众大概走的太急，有不少牛、驴没有拉走。我们高兴极了，七手八脚杀了几头充饥，并按红军的纪律给户主留下银元。然后，我们找了一些便衣换下军装。

黄昏时分，我们正要出发，村外传来一阵枪声。糟糕，敌人来了！我们急忙分头往外冲，但是都被打回来，敌人已把村庄包围了。我们十二个人只好躲藏在一间小屋里，观察动静，伺机再动。可是敌人已发觉我们没有武器，一个个便肆无忌惮地端着刺刀闯到门前，有个沙哑的声音狂叫着：“你们跑不了啦，快投降吧！”“投降”？我们被震怒了。可是，打，没有枪；冲，出不去，真如雄狮被困于兽笼，十二个人急得团团转。

这时，“哗拉”一声，几把明晃晃的刺刀从窗口伸进来。最后的时刻到了！那位老大哥镇静地向敌人的刺刀扫了一眼，转身对大家说：“同志们，我先走了！你们如果有幸不死，一定要找到党，找到红军，替西路军雪耻，为死难的同志报仇啊！”说完，他和大家一一握手，从容不迫地走出小屋。当时几个敌人一拥而上。老大哥大喝一声：“干什么？要杀，就给老子先来一枪，少他妈的啰嗦！”他用力推开敌人的刺刀向前走去。“乒”！罪恶的枪声响了，我们亲爱的老大哥英勇地倒下去了。护理员小刘第二个走出去，敌人见他是十四五岁的娃娃，便推到一边，说要带回去当儿子。在敌人的催逼下，女护士小林擦干眼泪走出屋

子，敌人先是贪婪地盯着她，接着蜂拥上来肆意调戏她。小林破口大骂，拼命反抗。目睹这种不堪入目的一幕，我的肺都要气炸了！呼地跳出屋子去救小林。然而，三把刺刀冷冷地挡住了我。大概是我的行动扫了他们的淫兴，一个家伙瞪着狼眼对准我的前胸，挺枪就刺，不意被旁边一个长着大胡子的人用手挡住。这家伙可能是个小头目，两只眼睛在我穿的皮大衣上转了几转，恶狠狠地命令两个喽啰：“去，给老子脱下来。”

在红四方面军，医生受优待，大衣、帽子都是特制的。两个士兵一左一右地把我的大衣、帽子强行扒下来。这样，我腰里挎着的药包就露了出来。大胡子见了，眼睛一亮，问道：“你是医官？”我把头一扬没理他。他火了，挥拳就打。这时，身后有人冷冷地说道：“慢着！”大胡子闻声，急忙收回拳头，对那个人媚笑说“啊，马副官，这小子是个医官。”那个被叫做马副官的人约四十多岁年纪，黝黑的脸膛和过膝的皮靴一样。他盯着我说：“你是医生？”“是医生怎么样？”我反问了一句。他没吱声，扭身走到几十米外，来了一个骑马的人，他上前报告：“团座，那小子是个医生，我看带他回去吧！”马上的人用鼻子哼了一声，表示同意。那个副官回来对我说：“跟我走吧！”他见我穿着短裤，从地上拣起条毯子扔给我，我披上毯子，随他向敌团部走去。

这位马副官把我带进他的住房后，便改变了刚才冷峻的态度，和善地笑着让我吃饭。说真的，折腾了一个下午，也确实饿了，管他面临着的是凶还是吉，先吃饱肚子再说。饭后，马副官问我是哪里人，多大岁数，当了几年医生，我一一说了。接着，他问我愿不愿意留在这里干，我一口回绝。他见我态度很坚决，便笑了一笑，接着向我讲开了他的一些情况，说他家境贫寒，有

些文化，就提拔他当了副官，他叹了口气说：“你们红军作战真勇敢，被俘后，一个个都不怕死，我实在很佩服。据说你们要去打日本鬼子，如果我们消灭了你们，把日本鬼子打不败，对老百姓也不好。现在我官位小，没什么权，只能悄悄尽点心意，救你一下。你可以相信我，先在这里委屈几天，待以后有了机会，再去找你们的队伍吧！俗话说，留得青山在，还愁没柴烧吗？”我见他言真意切，便点了点头。当天晚上，马副官找来一身军装，一把军号，一匹马。要我扮作他们的号兵，并嘱咐我：“部队即日就要起程回西宁，一路切记处处小心，时时在意，千万避开团座的眼睛，免得他一时起性，加害于你。”

我暗暗记住马副官的话，在途中尽量避着敌团长。马副官又让传令兵和勤务兵在暗中掩护我，将我夹在他们中间走。这样，就平安地到了西宁。

（二）

到了西宁以后，马步芳决定把被俘红军集中起来，强制劳动，为这伙吸血鬼创造财富。这时马副官对我说：“小兄弟，我是没法留你了，你到了那里要好自为之，多多保重。你是医生，他们或许会让你到医院去，以后有空子我去看你。”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我对马副官有了一定了解。临行前，我含泪向这位同情革命、同情红军的老大哥深深鞠了一个躬。他急忙扶起我说：

“兄弟，快别如此，在外闯荡，谁也难免有个三灾六难，说不定将来我还要你搭救我呢！”接着敌人就从我们中间选拔了十八岁到二十来岁的青年三百多人，临时组成了三个劳动队，编成一个营，调往民和享堂镇。在敌旅长马全义的管辖下，完成了艰巨

的享堂桥东西两岸的石方工程。时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三七年二月。完工后，又将我们迁到循化查汗大寺、古什群峡等地，开荒修渠，筑路修桥，修造房屋。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，我们用简单的背斗、铁锹、镢头等工具，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，而生活却是极端艰苦。每班发了个小铜锅，吃的尽是菜汤和发霉了的豆面糊糊、饼子。晚上，在薄草铺上席地而睡。寒冬腊月，屋里没有火，冻得我们缩成一团，挤成一堆，许多同志的手脚被冻得红肿溃烂。我们如有伤残疾病，从不给治疗；小伤小病，大家互相帮助，用土方法治疗；重病重伤，只有束手待毙。就这样，我们在这个集中营里，不知有多少好同志失去了宝贵的生命。有个姓陈的医生，不堪忍受这种非人的折磨，愤然出逃，但被敌人追了回来，吊在树上狠狠打了一顿。当时他考虑到路途遥远，党和红军下落不明等情况，同志们相约暂时不再逃跑，就地和敌人展开斗争。

敌人不仅从肉体上百般摧残我们，而且从政治上欺骗、瓦解和毒化我们，妄图使我被俘红军从思想上解除武装，放弃共产主义理想，充当他们的顺仆和走狗。起初，他们只是登记一下年龄、籍贯就算了。关于在红军中任的是什么职务，是不是共产党员，一般不加过问。后来，他们接受了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的建议，在弹压之下，由党政负责人轮流给我们集体“训话”。这些国民党、马步芳的特务人员，在讲话中肆意攻击我们党和红军，说什么“违背了总理遗教”，还欺骗说“在蒋委员长英明指挥下，共党已亡，红军已灭，中国已经统一，外侮不足为虑。”要我们“悔过自新，改恶从善”。并且声言只要主动交待过去的“罪行”积极揭发他人，就能释放回家，与亲人团聚。对这些恶毒的攻击和骗人的鬼话，我们十分气愤。红军战士身可囚而志不

可屈。对每次“训话”，我们都以沉默来抵制。对一些年纪小而容易受骗的同志，我们都暗暗地及时进行帮助教育。记得曾经有一个同志被敌人所诱惑，在劳动中公开指出某某人是党员，某某是干部，向敌人告密。同志们后来就用铁锹把子狠狠揍了他一顿，告诉他胆敢再使坏，决不客气。就这样，我们互相帮助，互相教育，互相监督，保持了革命气节，再没有人当软骨头。同时我们还在劳动中千方百计损坏工具，拖延时间，欺骗敌人，搞的敌人“干瞪眼”，没办法。

我自小务农，身子很结实。然而，集中营里繁重的体力劳动和非人的生活待遇，却把我折磨成面黄肌瘦。一天，我正拖着病身子一歪一歪地抬石头，一个监工手持鞭子笑着叫我回屋里去，说什么“你小子有造化，小娘们接你来啦！”当时我疑想，在这个集中营里，谁会来看我呢？回到屋里一推门，一个衣着整齐的女人一头扑过来抱住我。我定神一看，啊，原来是王桂英！

桂英原是我们医院的护士，长得很秀气，在医院里和我很要好。那时，同志们常开玩笑，说我俩是天生的一对儿。然而在战事频繁的环境里，别人说归说，我们谁也没有向谁亮过牌、表过态。部队分散行动以后，我俩曾一起进山，不料在一次躲避敌人的追击中跑散了，急得我到处找她也没找着。痛苦之余，既怕她死了，又怕她还活着。如果死了，我就算失去了相爱的朋友；如果活着，她定难逃脱敌人的凌辱。但是，现在我才得知桂英不但没有死，而且当了一个敌人医院院长的干闺女，居然还厚颜无耻的找上门来，这真把我气坏了。一个红军战士竟甘心认贼作父，我感到是对红军的莫大侮辱，也是对党的莫大侮辱。

我冷冷地看着她，她似乎从我的目光中看到了谴责和鄙视她的意味。便呜呜地哭了起来，并向我诉说了跑散以后的遭迁和对

我思念之情。最后她说：“我知道你在恨我，嘲笑我，可你要知道我走这一步也是没有办法的呀。我们落到豺狼手里，有那一个姐妹能免遭侮辱？！失身以后，我多次想到死，但是你和我过去的爱拉着我，不让我去死，我正是为了你，我才认贼作父，在屈辱中投生的。”我望着她那眼泪汪汪的脸，心里不禁一阵难过。莫非我真的错怪了她？！难道为了我，她就非要认贼作父不可吗？桂英见我默默无语，拭去脸上的泪又说：“欧阳辉呀，看到你瘦成这个样子，我的心都要碎了。跟我走吧，到医院去，你有技术，我和院长说好了，让你到那儿去当医生。”给敌人当医生吗？为杀死我无数战友和兄弟姐妹的刽子手们治病？不！宁愿死我也不干。我把这个想法直接告诉了王桂英，她惊讶了。半晌，才叹气地说：“我没想到你的性子还是这么烈，你就不想一想事到如今，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。回老家，千里迢迢，插翅难回！找党、找红军，这么大的中国何处去找寻。再说从狼窝里回去，人家能不嫌你身上的臊味吗？一张鼓难敌八面锣，咱们有口难辩呀！还是跟我去吧，让我们永远在一起，就在这西宁古城成家立业，把我们昔日的美梦接着做下去吧。”说到这里，桂英的眼里闪烁出一种灼热的光芒，热辣辣地盯着我，期待着我作出回答。我细细回味着她的话。然后告诉她：“桂英，你这样关心我，我很感动，但是我不能如你的愿。因为那儿不是一个红军俘虏久留的地方。我在这儿虽说很艰苦，并随时有被杀害的危险，但这儿有我们的同志和战友啊。和他们同生死，共命运，我心里会更加快活些。桂英，让我们各自面对现实，忘掉过去吧！”我的这番话，她既没有风雷，也没有闪电，却那样沉重地触痛了桂英的心，她低着头默默流着眼泪。过了好久，她挣扎着站起来，掩面离去。我望着她那渐渐远去的身影，我的心里仿佛

失去了什么。桂英走后，又多次捎信让我去，并给我带来不少的食物和穿戴。然而，在气节和爱情中，我选择气节，我却没有去看过她，直到后来离开西宁，一直没有和她见过面。

(三)

转眼到了一九三七年底，经过一年多的摧残折磨，补充团三千三百多人只剩下两千六百余人，大多面容憔悴，体质虚弱，腿脚失灵，不能干活了。这时，适逢蒋介石向马步芳要兵，于是，马步芳将我们其中的一百五十人顶了青海应征国民兵的名额，转手又向各族人民摊派了征兵款，每名作价三百块银元。同志们都认为这是逃出魔窟，重见天日的好机会，因此不作抵制。我们

“顺从”地换上国民党的军装开赴内地。第一批没有抽上我。不久，又开始抽调第二批，不料又没有轮到我，我就暗暗地找到送兵的马排长，要求他把我带上。这家伙怕我们在路上乘机收拾他，便答应了。出发那天，我抢先藏在半路上等候。因为我们即将成为“国军”，对我们看管也不那么严密，所以我顺利地插进队伍，到了兰州。

在青海的集中营里，我们看不到报纸，听不到广播、不知道国共已经合作，当年的红军也已改编成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。到了兰州，我们才知道形势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。党还在，红军还在，我们的心像滚水一样的沸腾起来，恨不得插翅飞回党的怀抱。然而国民党惧怕猛虎归山，因而愈到内地对我们就看管得愈严。在兰州，他们把我们和抓来的壮丁分插编班，连门也不让出。接着又分批用火车送往南方前线。我乘的那列闷罐车，行到临潼停下加水时，乘这个空子，我装做要小便，跳下车就躲进附

近的厕所里。心想，如果有人追问，就说是拉肚子；没有人问，等火车一开就溜出车站，往黄河边上跑。当时听说八路军在那一带打鬼子，打得可好哩！我忐忑不安地蹲在厕所里，一分钟比一天还要难挨。好不容易等到汽笛一声长鸣，火车便开动了，于是我才安下心来。正当我出站时，不料从旁突然走出一个持枪的哨兵，拦住我问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我吃了一惊，但很快镇静下来说：“我想家，要回家呀！”“嘿嘿，回家！”那家伙晃着脑袋恶狠狠地说：“你小子是想开小差吧，你是从火车上溜下来的。哼，瞒得过旁人，可瞒不过老子，走，到团部见官长去。”我看看四周站着的全是国民党兵，不敢违拗，默默地随他到了团部。国民党军队对待逃兵是不客气的，尽管我并不是从这个部队逃跑的，还是被他们“赏”了几个耳光，然后押到团电话排充当了二等兵。

一天晚上，我到车站去转游，见到一个五十岁上下、身穿灰布军装的人，正和一群旅客说着八路军打日本的事儿。他那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，立即引起我的注意，莫非他是红军？是亲人？！我心里一热，不顾一切地挤进去把他拉到外边，我问他：

“你是八路军？”他打量我一下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电话班班长，听你口音是江西人吧？”“对，对，对！我是西路军被俘的红军啊。在马步芳的集中营里关了一年多，又被他们送出来当了兵。同志，我可找到你们啦。告诉我，咱的部队在那儿？我要回部队去。”老班长看我一脸急切的神情，嘿嘿地笑了。“咱的部队离这儿可远啦！你瞧，在北边，在山西前线哩。”于是我把闷在心底的问题一股脑儿向他提出来。这个老同志很健谈，从他的谈话里我得知了红军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，有了很大发展。有些当年熟悉的老首长，现在还健在；八

路军在西安还有个办事处。我们畅谈了好大一阵功夫，便一起回到电话排，共同商量找党、找红军的问题。

一个月后，我俩悄悄从灵宝上火车到了坝桥，离西安还有四十多里路。灵宝的火车，当时只通到这里。坝桥车站驻有国民党贵州地方部队一四零师。我和老班长一前一后往出走，引起了哨兵的注意，他把枪一横，拦住我们问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我们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话告诉他：“我们是八路军一一五师的，我们请长假回湖南去，在潼关叫人偷了路费和护照，回不了老家了，只好到西安去找八路军办事处。”我们这番话并没有消除哨兵的怀疑，他把脖子一拧说：“你们不是八路军，你们是国军开小差的吧！”我们竭力争辩，他狡猾地要求我们拿出证明来。实际上，我们悄悄出逃，那里有证明，他见我们拿不出证明，便把我们带进连部。这位连长五短身材，一脸横肉。他气势汹汹地说：“看你俩的眉眼，就不是好料子，老实说，是不是开小差的？”我们一口咬定是八路军一一五师的。那连长很不耐烦地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老子没空和你们磨牙，是八路军也好，是逃兵也好，统统不追究，就留在这里当兵吧，亏待不了你们。”我们一听让我们留下当兵，连忙拒绝说：“不行，我们是八路军，你不信就到西安办事处去问嘛。”他把手一挥说：“少他娘的啰嗦，去，站队出操去。”我俩打定主意不去。他见我们这么坚决，便恼悻悻地说：“好吧，既然你们是八路军，老子也不留你们。不过你得先打来一个证明才行。”他指着老班长说：“你去打证明吧，来了证明，老子再放他走。”

老班长走后不久，我故意大发脾气，又跳又骂，闹得他们连里的许多士兵，都围上来看热闹。那个连长轰了几次也轰不走。这家伙见留不住我，便说：“滚，滚吧！给老子把棉袄、棉裤脱

下来，滚！”哨兵认为时值寒冬腊月天，我决不会脱掉棉衣的。而我因找组织心切，又正在火头上，一听到这话，便连脱带撕地把棉衣裤扔在地上，拔腿就朝着西安方向跑去。

“站着！”耳际又响起一声嚎叫，眼前又闪出一柄刺刀。铁道边的一个哨兵狞笑着把我挡住。这，把我气急了，即对着他的脸狠狠地打去。接着，哨棚里又冲出一群如狼似虎的士兵。他们对我拳打脚踢，把我打倒在地，我默默地忍受着，昏迷中听到一个当地老乡在为我说情。“老总呀，你们不要打他了，他是个疯子呀，这样三九天，有哪个，这么单衣薄裳的呀，算了、算了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别和他一般见识喽。”那些士兵们走了以后，老乡把我扶起。于是我给他重重地磕了个响头。然后，挣扎着向西安走去。

（四）

经过一年半之久的磨难，一九三八年二月初，我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。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热情地接待了我，一位保卫干事问了一些情况后，便发给我一身崭新的军装，当我重新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，心情十分激动，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热泪。

在西安愉快地渡过春节后，我回到了延安。当我走进总卫生部的院子时，总卫生部长孙仪之同志急步迎过来说：“欧阳辉同志，你可回来啦！同志们知道你还活着高兴极了，都等着你回来呐。”正说着，很多熟悉的首长和同志们拥了进来，把我围在中间，争着和我握手。我置身于这火一样的热情之中，情不自禁地又一次流出了幸福的热泪。

晚上，同志们为我的归来开了个欢迎会，我把被俘后的情况